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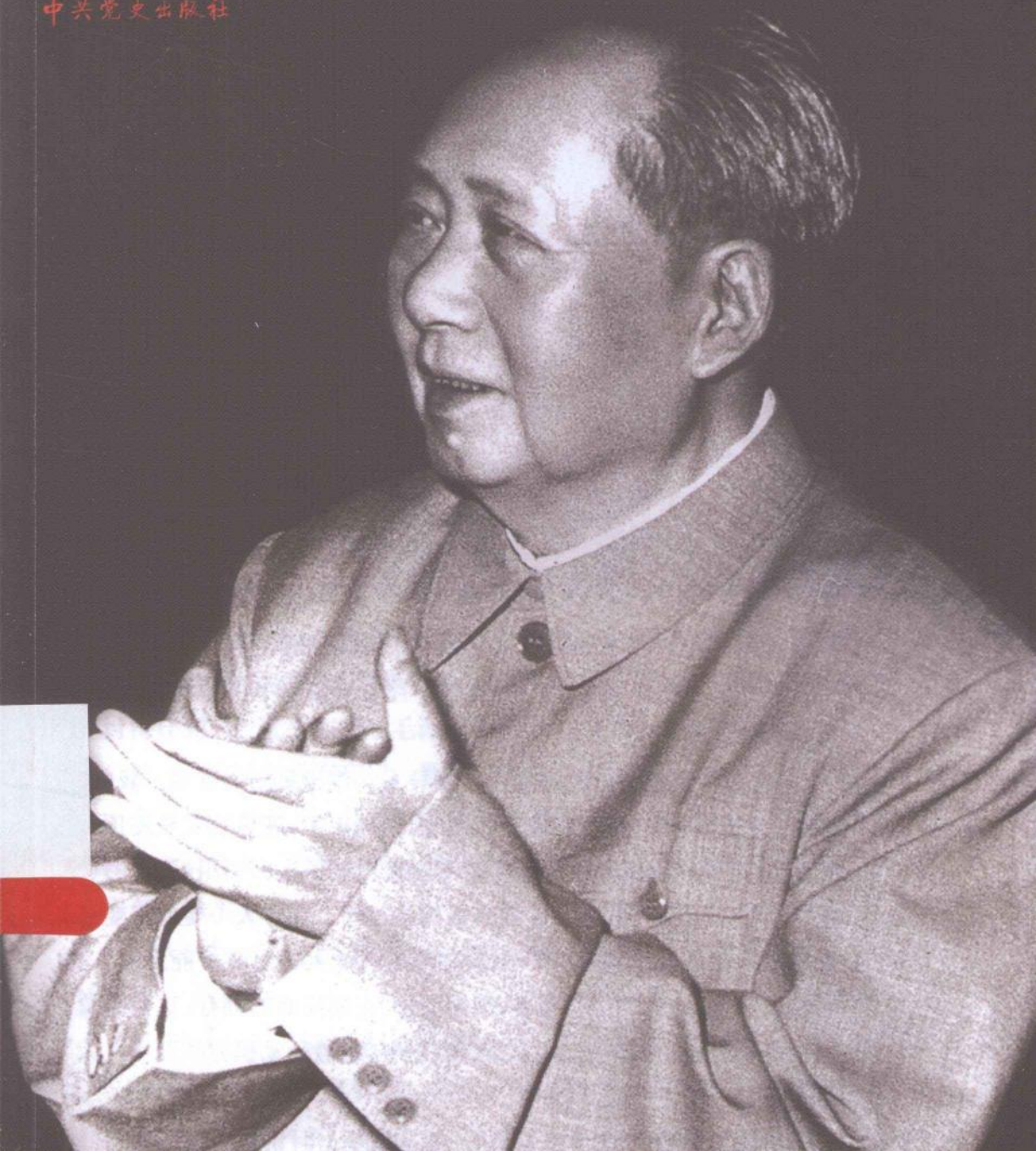
# 治国录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陈冠任◎编著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③

中共党史出版社





# 治国录

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 ③

The Leading  
of a Nation: Mao Zedong and  
Post-1949 China

陈冠任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中，中国的变化以及这个极大的国家的伟大的进步最主要的是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

——挪威前首相努尔德利

# 治国录

毛泽东与 1949 年后的中国

## 第四章 三年人天大战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他是八亿人民的心脏和发动机。他通过他的主要是以对内对外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学说使八亿人民恢复了自信心……

——德国基社盟前主席弗朗茨·施特劳



## 1.毛泽东突然大喊：“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195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社论。社论说：1958年就全世界说，帝国主义世界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世界一天天好起来，就中国说，我们不但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而且在这条康庄大道取得了丰富经验。这就使得我们不但有可能在1959年继续跃进，而且可能跃进得更好。这篇社论对过去一年政治、军事和经济工作作了评价，也展望了新的一年。

1月27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他说：“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

是小孩子，现在我们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正面肯定这是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注意。”他还说：“从总的来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我们都是实践中找经验。这是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在高潮中有些人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

这时候，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让毛泽东很不放心。

2月21日，他与河南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主要是谈人民公社的性质、分配等诸多问题。

由于农村的“共产风”并没有完全煞住，加上对因高估产、高征购引起的瞒产私分进行的不适当的斗争，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仍然很紧张。2月23日，正是农历正月十六日，才过完春节，毛泽东再次外出视察，继续对人民公社进行深入调研。

当日，他在天津，与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等人座谈。24日和25日，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有关省、县负责人了解公社分配问题。26日，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及有关地委书记座谈。

在几个省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毛泽东发现问题还不小，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继续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在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人民公社的“按劳分配”问题，认为以前没有解决，说：“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

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

他甚至还说：“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在会上，他还批评了“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的“共产风”。

次日，他在大会上继续讲话，讲了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还是对“一大二公”开炮。

3月1日，他在大会上再次讲话，指出：“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

3月5日，他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为了纠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倾向，毛泽东提出了14句话，



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会议结束时，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毛泽东的讲话首先在河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昌地区的群众说：“主席看透了农村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我们成天在农村，看不见问题的实质。在下边遇到很多群众怕上调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老认为是群众落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这次听了主席指示，脑子才开了窍。”

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连续四次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写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要求他们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贯彻会议精神，着手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和调整。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召开五级、六级干部大会，把会议精神“一竿子插到底”。他的这些措施，就是为了使广大农村赶在春播前落实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达到不耽误农事的目的。

3月底，毛泽东来到了上海。

4月2日至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召开，检查人民公社整顿工作、该年度的经济计划指标和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

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为了不扰民，毛泽东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住在停在路边的专列上，住在“大自然”里。

一天中午，卫士长李银桥见他睡着了，按他平时睡眠四小时算，估计要到下午才能醒过来。于是，便进城到干部俱乐部办事了。

谁知当他赶回专列时，毛泽东已提前起床，且进城开会去了。这下李银桥可着急了，卫士长把保卫的对象丢了，怎么办？他急忙赶去

毛泽东开会的地方。可毛泽东已开完会，去吃饭了。他问清楚毛泽东在饭后要去干部俱乐部和大家一起去看《小刀会》演出，便先在汽车旁等候。

不久，毛泽东出来了，旁边有柯庆施等人陪同。李银桥忙抓住车门，准备等他过来登车。可是，毛泽东发现了他，突然站在台阶上不走了，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大声喊道：“李银桥，你是干什么的？”

他的声音很大，一脸愠气。李银桥一愣，什么事啊？他怎么突然发脾气了？急忙朝台阶上迎去。毛泽东也朝台阶下走来。李银桥急忙上去搀扶着他，坐到了小汽车里。

汽车往俱乐部开去。李银桥发现毛泽东时不时地吮一吮嘴唇，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反正是不高兴的样子，且还生着闷气。到了俱乐部，下了车，走到了礼堂，坐下来，他还是不理李银桥。直到戏开始了，他进入了剧情，才忘记了生气的事，随着剧情的变化，开始变得有说有笑了。

演出结束后，在坐车回专列的路上，李银桥还是和毛泽东坐在一块。他小声地问道：“主席，今天出什么事了？惹你生气了？”

毛泽东嘟着嘴，翻了他一眼：“还说呢，把我嘴都烫坏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嘴烫坏了为何发李银桥的脾气呢？原来李银桥走后，他醒来了，起床吃过饭后漱口，另一名卫士去侍候他。谁知水太烫，卫士没试水温，就递了过去。以往，李银桥送茶时都要先试一试水温，不烫不凉才递上去。他已习惯了李银桥的做法，这次接过来就是一大口，结果，立即喷出去了，并且烫得不轻。事后，他真的对李银桥生气了，竟然当着众人朝他喊了那么一嗓子，但之后气就全消了。

毛泽东与身边的卫士们亲如父子。几十年过去，李银桥回忆此事时，由衷地说：“毛主席有时发脾气，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赌气一

样，是很有意思的。在他身边15年，他只对我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充满了孩子赌气的味道。”只发过的一次脾气，就是指这次“烫嘴事件”。毛泽东就是这样无私坦荡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生，只有主义之争，而无其他一毫私利之争，他会发脾气，但无一丝小肚鸡肠，胸襟坦荡无私，光明磊落。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再次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会议纪要，规定：

(1)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小队为包产单位，生产小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它对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力等有固定的使用权，完成包产任务之外的收入可以自行支配。

(2)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旧账”，凡是县、公社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劳动力、土地、房屋、家具、耕畜、资金、工具等，都要进行清理，归还原主或照价赔偿。

(3)银行收回的没有到期的贷款，一律退回，从公社统一扣还的原高级社或私人所欠贷款，也一律退回。

(4)实行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要完善现行的工资制度，对供给制进行适当的限制。

(5)要保证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少于总数的80%，从事其他生产和服务的劳动力则不能超过20%，城市、工矿应停止从农村招工，并把可以缩减的临时工退回农村。

两个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也按照去年年底一系列会议的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落实，钢产量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煤从原来的4亿吨确定为3.8亿吨；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也作了相应变动。粮、棉指标维持不变，但其他主要

农产品比原计划有所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 360 亿元减为 260 亿—280 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原定的 1500 个减为 1000 个左右。

## 2. 管住“一张张馋嘴”

1959 年 4 月下旬,全国人大第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主要是讨论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以及西藏叛乱等问题,并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世钊在几个月前当选湖南省副省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毛泽东特地约见他,向他了解基层情况。

在谈话中,毛泽东问道:“在召开人大会议之前,今年你到了哪些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东西,有何感想?”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组织我们这些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到了少奇同志的家乡,也就是我的老家宁乡县,参观视察农村人民公社。这次参观学习,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周世钊说,“不过,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有些什么问题?”毛泽东立即问道,“你这次有机会到农村去看一看,很好,很好。”

“一个问题是在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一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田一次能产几千斤稻谷,甚至有的说一亩田一次能产一万多斤稻谷。我看有点不实在。”

“我看你的收获还不少,你下去一次就看出了问题,这不简单

啊！现在农村确实有一股华而不实的浮夸风！恩来同志对我说，情况还比较严重，很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开会进行研究。”毛泽东说。

接着，他又说：“现在农村到处放什么‘卫星’，一亩田只有那么600多平方米宽，一个巴掌宽怎么能做到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几万斤稻谷？那是吹牛而已，事实上他们是在瞎胡说！从科学技术上讲，是反科学的，办不到，至少是目前没有办法办到！”

周世钊被他的话一说，再也忍不住了：“再一个问题是我们这次在一个公社吃了一顿中餐，一个桌上共计上了68道菜肴。公社负责人对我们说，招待我们的这些菜，他们没有花一个钱，都是公社自己生产的東西。不知道公社怎么能搞出那么多菜来？有很多菜我们这些代表根本就沒动筷子，就好比慈禧太后餐桌上的‘看菜’，只是看一看。我们实在吃不了那么多，有些菜端到桌上摆一下就拿走了。我看浪费实在太大，这种搞法要不得！”

毛泽东听着他的话，脸色急剧地变化，良久才平静下来，望着周世钊问道：“68道菜是些什么菜啊？咋回事呢？”

“我们住在宁乡县人民委员会招待所。白天乘车到公社和大队参观，晚上回所住宿，早出晚归。”周世钊详细地说起了此事经过，“一天，我们到一个公社视察，听了汇报后，留我们在公社小食堂就餐。这顿中餐吃了两个多小时。宁乡县的各种名菜和名酒，统统都端上了饭桌。每桌一共上了68道。菜肴太丰盛、太多，许多菜根本没动筷子，摆了摆，代表们‘过过目’，就拿走了。这68道菜肴，鸡鱼鸭肉用了多少，都难估计。”

他说完，毛泽东反问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对这样如此丰盛的餐食招待，代表们当时的看法很不一致。”周世钊告诉说，“有的叫好，说这个中餐，太丰盛了，体现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丰收景象，反映广大农村的形势大好；有的说，这是有生以来

第一次吃上这样的中餐，菜上得太多，吃不了，浪费太大；有的说，我看公社负责人打着招待我们的旗号在摆阔气，这种搞法有问题。”

“你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堂堂的国会议员，人大代表、国会议员到了农村，他们不好好招待你们行吗？他们招待你们的目的，是要请你们这些人大代表，到北京来给他们说好话嘛！他们油了你惇元兄（周世钊的号）的嘴巴，你吃了他们 68 道佳肴，你不但不为他们讲好话，反而还要讲他们的坏话，我看他们会要骂你的！”毛泽东说。

随即，他接着就改变了口气，说：“我说你是个好人的。你好就好在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敢于跟错误行为作斗争，这是可敬可佩的！”

说完，他意犹未尽，严肃地说：“不与错误行为同流合污，敢于向错误行为作斗争，这是我们每个同志应有的品德。他们招待你们这些人代表的这 68 道菜肴，是从哪里来的？这些菜都是从下面‘平调’上来的！所以他们才说没有花一个钱呢！他们招待你们的那些鸡鸭鱼肉，都是从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调来的！这不仅是您刚才所说的浪费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钻了搞人民公社的空子，侵犯了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对他们这种搞法，肯定很不满意，肯定要诅咒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泥土都能看透三尺。他们明目张胆招待你们，实则是他们自己大吃大喝！”

这种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事情的本质。

对于党内的吃喝风，毛泽东一直抓得很紧，从建国前开始就抓此事。1948年4月1日，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建国后，在东北几省，他就为此批评过人，发过脾气，给高级干部们敲过警钟。他接待几次外宾后，认为接待工作有两大浪费：一是礼仪繁多，搞一些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浪费大家很多时间；二是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扔掉的

多，白白浪费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为此，他废除了繁琐的礼仪，国宴简单化。可以说，他管住了高级干部们的“嘴巴”，谁知吃喝风在基层还是出现，没有断绝。这68道菜肴，且还是出现在党的领袖的家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最后，他对周世钊大声地说：“这种大吃大喝的‘平调’之风，必须严加制止！”

后来，他针对农村各地出现的情况竟发出“永远不要一平二调”的严厉话语，虽不一定与这次周世钊汇报“68道菜肴”有关，但此刻他声色俱厉，可谓是横眉冷对。由于他对吃喝批评历来十分严厉，在几十年中还真管住了那些“管不住的嘴”。

毛泽东是如何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呢？其实只用了一招儿，且一招儿就灵。这一招儿，就是从我做起，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有一条铁的纪律，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律不许占公家任何便宜。他本人从不去吃喝，任何时候都是粗茶淡饭，不骚扰地方，也不占公家便宜。他下乡搞调查，不住宾馆，回到火车上住宿，为什么，就是免得当地接待他吃饭、住宿。他就是要住下来，也必定交代不准请吃也不招待。他请基层的人员吃饭，也是极其简单的饭菜，既不见排场，更无大鱼大肉。他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十分分明。给他当了12年“生活管家”的吴连登后来对人说：“毛主席喜欢吃武昌鱼，但是从来都是自己付费，毛主席的餐食费用全部由他自己掏腰包。”

毛泽东的老部下、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儿子陈人康在回忆父亲《一生紧随毛泽东》一书中说：“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他说的时间约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高级干部们去过北京饭店，但都不敢吃喝。陈人康跟着父亲去，也只蹭过一碗面条，随口就说：“太淡，没味道。”陈士榘立即呵斥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吃喝吧。而据陈人康这段回忆，毛泽东却是从来不去的。他只向北京饭店要过一次饭，那是一外宾来了，毛泽东获知他还没吃饭，才叫工作人员从那要了几个菜，算是给外宾吃了中餐。

历朝历代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并且为“官场顽疾”。而毛泽东却管住了“一张张馋嘴”，有人称之为“奇迹”。其实，这样的奇迹与毛泽东本人以身作则分不开，自己正了，才能一招儿“定乾坤”。有人认为吃吃喝喝，坏不了大事，倒不了天，对毛泽东此类做法，巴基斯坦《晨报》后来是这么评说的：“世界上有许多革命不幸迷失了方向，忘记了本来目的，但是毛主席使中国革命保持了纯洁，不断前进……毛主席怎样说就怎样实践，在他指导下的中国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毛主席是一位具有伟大理想的伟大人物。他是战士，是领导者，也是诗人和著作家，但是生活朴素，这种朴素作风鼓励了亿万中国人，他们对建设新中国作出的贡献大于他们期望于国家的报酬。正是这种朴素作风和不知休息的努力使中国保持了革命的动力。”<sup>①</sup>

### 3. 春荒后北旱南涝：人为因素加天灾

谁也不会料到，1959年春，中国历史却再次极富戏剧性地拐了

---

<sup>①</sup>《不朽的巨人》，巴基斯坦《晨报》（1976年9月11日），载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



一个大弯儿。

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卸任了国家主席之职。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为他的工作要少一些了。谁知他的工作量并没少下来，相反，除日夜办公外，心情更没了原来那么轻松。

这并不是他卸职了，不当国家主席，就心情变坏了。不当下届国家主席，他多年前就下了决心，为此多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前打招呼。在这次人大会议召开前，他要求各省市县区乡对此进行讨论，免得届时感到意外，还向苏联驻华大使、前印度大使尼赫鲁和中国驻英大使馆代办宦乡等人进行吹风。卸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带头之举。

他心情不好，是因为各地上报来的春荒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发展，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众，全国并没完全解决吃饭问题，不少地方会缺粮。如1953年和1955年，全国因此发生过两次大的粮食风潮。1957年是大丰年，河北省粮食总产量也只有81.91亿斤，人均不过223.19斤，每人每日不到一斤，要靠中央调入7.27亿斤粮食，省委才能安排下来让群众不饿肚子。春季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缺粮时间，因此又叫“春荒”。春荒一直是中国没有根治的顽疾，几乎每年都有。

然而，1958年的春荒，不仅惊动了毛泽东，而且也成为一场罕见灾难的发端。

4月份，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战士李宝森回山东德州平原县老家探亲，发现家乡遭受严重旱灾，群众没粮食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平原县属于鲁北地区，盐碱地严重，一直是山东的贫穷地区。然而，这里一些干部却作风简单粗暴，引起群众对政府不满，讲怪话，发牢骚，不下地干活。情况很严重。他本计划在家乡住20天，因没粮